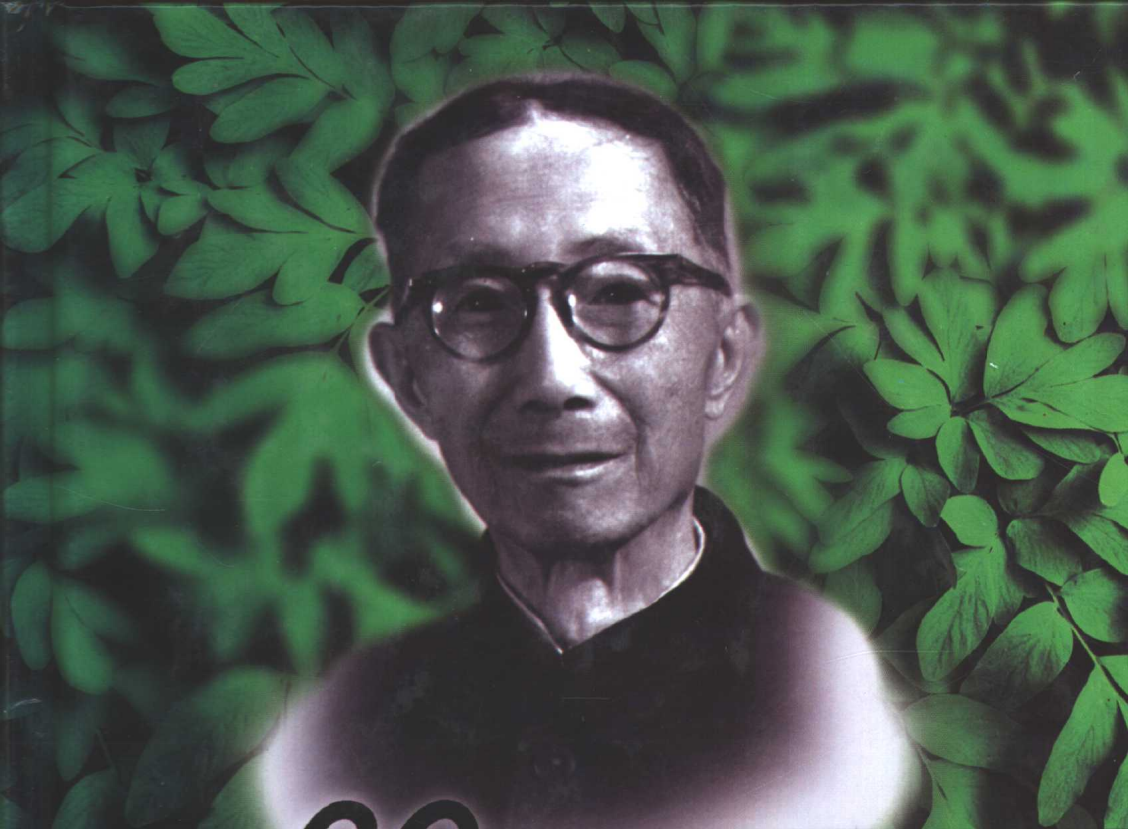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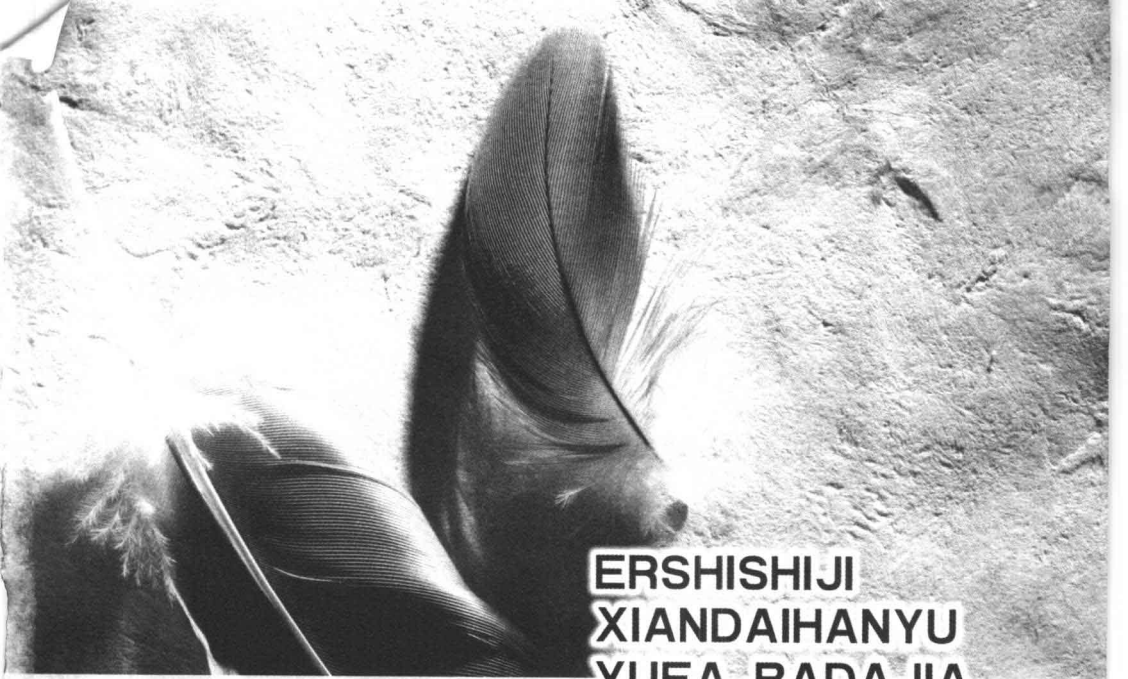


20世纪
现代汉语语法
八大家

黎锦熙选集

季羨林 / 主编

黎泽渝 刘庆俄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ERSHISHIJI
XIANDAIHANYU
YUFA BADAJIA

季羨林 / 主编

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黎锦熙选集

黎锦熙 / 著

黎泽渝 刘庆俄 / 编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长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黎锦熙选集/黎泽渝 刘庆俄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6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ISBN 7-5602-2837-2

I. 黎… II. ①黎… ②刘… III. 汉语-语法-现代-研究-文集 IV. H1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6378 号

☐ 出版人: 贾国祥

☐ 责任编辑: 吴东范 ☐ 封面设计: 李冰彬

☐ 责任校对: 周红 ☐ 责任印制: 张允豪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130024)

销售热线: 0431-5695744 5688470

传真: 0431-5695734

网址: <http://www.nnup.com>

电子函件: sdcbbs@mail.jl.cn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7.375 字数: 450 千

印数: 0 001—4 000 册

定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可直接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序

季美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多年来致力于出版语言学论著,卓有建树,为国内外语言学界所同声赞佩。最近又推出《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黎锦熙选集》、《王力选集》、《吕叔湘选集》、《胡裕树、张斌选集》、《朱德熙选集》、《邢福义选集》、《陆俭明选集》(以年龄为序)。所推八家,实慎重考虑、缜密权衡之结果,对“大家”之名,均当之无愧。此举实有对 20 世纪中国汉语语法研究作阶段性总结之含义。这也是顺乎学术发展潮流、应乎业内学人心声之做法,一定会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欢迎。

为什么说“顺乎潮流”呢?

现在已经真正到了“世纪末”,再过一年,一个新的世纪,甚至新的千纪,就将降临人间。所谓“世纪”这玩意儿,本来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没有耶稣,何来“世纪”?可一旦被制造出来,就反过来对人类活动产生了影响。征之 19 世纪的世纪末,昭然若揭;征之 20 世纪的世纪末,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动,也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因此,专就中国学术界而论,包括文、理科在内的众多学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对过去 100 年的研究历程作出总结。回顾过去,绝不是为了怀古,而是为了创新。规模最大的可能是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备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大典》。此书涵盖面极广,文、理、法、农、工、医,都包括在里面,用的是词条的方式,由各有关方面的专家撰写。估计此书出版以后,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博”的典型。我们这套《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则另辟蹊径,先划定一个学术领域,结集一百年中业内“大家”之经典著述,既对20世纪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达到的高度予以总结和概括,又为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搭了一架“大师级”的人梯——这是世纪总结类著作中的“专”的典型。

谈到汉语研究,我首先声明:我并非此道专家;有一点知识,也是破碎支离不成体系。但是,我有一个特点——优点,缺点,尚难断定——就是好胡思乱想。俗话说:“一瓶醋不响,半瓶醋晃荡。”对于汉语语法学,我连半瓶都不够,所以晃荡得更是特别厉害。晃荡的结果我已经写在三年前《中国现代语言学丛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序中。我那一篇序的主要内容就是讲汉语与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不同的,写汉语语法而照搬西方那一套是行不通的。我最后说到,语言之所以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思维模式的不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分析、再分析,认为可以永恒地分析下去;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其特点是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综合的东西往往有些模糊性。世界上任何语言都有不同程度的模糊性,而汉语尤为突出。序的内容大体如此。这当然都是“晃荡”的结果。但我自信,其中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最近又重读先师陈寅恪先生《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师在六十六年前已经对汉语语法表示了明确的看法,深刻而有新见。我抄几段他的原话:

今日印欧语系谓之文法,即《马氏文通》“格义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于不同语系之中国语文,而与汉语同系之语言比较研究,又在草昧时期,中国语文真正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难也。夫所谓某种语言之文法者,其中一小部分,符于世界语言之公律,除此之外,其大部分皆由研究此种语言之特殊现象,归纳为若干通则,成立一有独立个

性之统系学说,定为此特种语言之规律,并非根据某一特种语言之规律,即能推之以概括万组,放诸四海而准者也。假使能之,亦已变为普通语言学音韵学,名学,或文法哲学等等,而不复成为某特种语言之文法矣。

陈先生在下面又说:

往日法人取吾国语文约略模仿印欧语系之规律,编为汉文典,以便欧人习读。马眉叔效仿之遂有《文通》之作,于是中国号称始有文法。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如梵语字典中,语根之说是也。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语言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同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在本文中,陈先生还有一些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不具引。

我对中国当代的汉语语法研究只了解一个大概的轮廓,详细深入的情况并不了解。这一项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是非常显明的。本套书列举的八大家,就足以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按照寅恪先生的意见,必须在从事与汉语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扩展汉语语法学的眼界,而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我也注意到,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眼光已经大为开阔了。比如徐通锵先生的《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绪论”中已经讲到“‘印欧语的眼光’和汉语的研究”,力求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如果把汉语与同语系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也深入下去,语言学的成绩将更大。

邢福义先生在所著《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把《马氏文通》问世后 100 年来的汉语语法研究大体上分为三期:

- (一)套用期:19 世纪末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
- (二)引发期: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70 年代末期;
- (三)探求期:70 年代末期—现在。

这个分法是有根据的,因而是能站得住的。邢先生说:“(探求

序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期)大约已 20 年。基本倾向是接受国外理论的启示,注重通过对汉语语法事实的发掘探索研究的路子,追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下面邢先生又说道:“应该清醒地看到,这门学科距离真正成熟还相当遥远。到目前为止,许多事实尚未得到深刻的揭示,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得到准确的解释。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都是很重要很中肯的意见。看来邢先生的想法是:所有这一切工作都是探求期第二阶段的任务,也就是说,是 21 世纪的任务。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探求?向哪个方向探求?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步骤去探求?在这些方面,邢先生的话,虽很正确,但不具体。我不揣庸陋,想补充两点。第一点是,要从思维模式东西方不同的高度来把握汉语的特点;第二点是,按照陈寅恪先生的意见,要在对汉语和与汉语同一语系的诸语言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来抽绎出汉语真正的特点。能做到这两步,对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才能搔到痒处。我这些话是不是显得太迂阔了呢?我自己并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21 世纪汉语语法学家继续探求的方向就应该如此。是否有理,那就要请真正的专家来指正了。

1999.06.29

黎锦熙先生评传

黎泽渝 刘庆俄

黎锦熙，字君缉、君劭、伯昕，号邵希、劭西、邵西，别号鹏庵等，湖南省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人。1890年出生在一个以科第起家的“书香门第”家庭。其族祖黎樾乔为清廷御史，祖父黎世缓宦游两粤、湖北、山西、热河、安徽等省，父黎培銓懒于仕途，考取贡生后，再不赴试，终生不做官，为乡里名士。

饱学国故

先生4岁即从塾师读诗，《诗经》为启蒙教材，著名画家齐白石曾教他绘画、刻印。九岁参加“罗山诗社”，喜好作诗、绘画、刻印、吹洞箫。11岁已读完“十三经”，《昭明文选》读了一半，诸子及唐宋名文读了许多，古今体诗读至万首。15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考中了最后一届的秀才。

但是先生生活的时代已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一些“新学”和“维新”的思想通过塾师不断地灌输到他幼小的心灵里。他不愿再埋头于“子曰”“诗云”，开始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命运，立志革故鼎新。十六岁时（1906年），受湘赣萍浏醴起义的影响，他从偏僻的晓霞镇来到省府长沙，与张子平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王阳明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的“致良知”为宗旨，鼓吹“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不久被官厅侦悉，出示拿办，因即逃匿还乡。

初试锋芒

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先生在1907年考入北京铁路专修科。在北京，他接触到更多的新思想、新学说，其中社会学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群学肄言》《社会学通论》是他业余时间最爱读的书。可惜该校次年毁于火灾，他只好返回故乡，另作他图。回到湖南，他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三年后，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值武昌起义，长沙响应建立军政府，他被湖南都督谭延闿聘为秘书，到任数日，发现军队复杂，无法办事，旋辞职。改办《长沙日报》，任主笔，鼓励各省反清独立，创办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不久被迫停刊。1912年，创办《湖南公报》，任总编辑。由于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主张绝对民治，该报也被查封。改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翻译欧美民主政治的书籍，并开始编辑小学教科书。他把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选入课文，引起教育界某些保守人士的惊骇。其实这正是他改革教育的第一个表现。他认为，帝制虽已取消，但建国任务繁重，要想建国，必先改革旧教育。他主张，再不能让中小学生学什么“四书”“五经”，作什么八股文了；应该让他们学新鲜有用的知识，学作语体文。因此，先生1914年在新合并成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时，便与杨昌济（怀中）、徐特立等一师的教师们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把介绍欧美新书和编纂中小学教科书、民众课本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先后编辑出版了《初等小学国文读本》第一卷、《初等小学国文读本》第二卷、《中等学校国文读本》四卷、《初等小学国文教学法》二卷。他们还创办了《公言》月刊，发表公正言论，批评教育界的歪风。但只发行了三期便被迫停刊。他们还发起组织了哲学研究小组，以曾赴英国留学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先生为指导，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学生中毛泽东、陈昌、蔡和森常来参加。他们

的影响超出了一省一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大展宏图

1915年，先生赴北京应教育部邀请任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后为编审员），开始了崭新阶段的生活。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新旧思想斗争的主战场。这使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更多的新思想，思考更多的社会问题。新的工作给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更大的活动舞台。当时，“君主制”虽已改为“共和制”，但全国大多数学校的语文课仍在讲“四书”“五经”，学生仍在学作八股文。因此，教育界存在着“国文”与“国语”之争。在这场关于语文教育能否新生的斗争中，先生不但旗帜鲜明地赞成改革，而且为其实现不遗余力地奋斗着。1916年发起成立“国语研究会”，大力宣传“国语统一”（即推广普通话）、“言文一致”（即普及白话文）。1918年，推动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任常驻干事。常到全国各地巡视调查国语讲习情况，并亲自讲学，推行国语。为了方便推行国语，为了根本改变我国给字注音的直音、反切等落后方法，教育部已于1913年创制了一套简单易用的注音字母，但由于政局的变动，更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这套注音字母迟迟没能公布。既没公布，当然就不能在全国推行。经过反复思考，先生认为由教育部正式公布这套注音字母已成为推行国语的急需。于是经他努力，教育部在1918年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及常用字的标准读音。为了方便人们手写，先生还亲自创制了注音字母的草体。他曾亲自到湖北、山西宣传注音字母。如果说这套注音字母在推行国语和普及教育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先生在推行和完善这套注音字母方面则是功劳的。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要想振兴中华，必须培养大批的有理想、有作为的新人。同时，要推广新思想、新理论，也必须有确实可靠的阵地。因此，先生从1918年到1927年，任北京市完全科师范学校的“国语”“新文学”科的教员。学生中有白涤洲、舒舍予（老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舍)等后来很知名的人物。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我国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先生不但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而且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正是在他和许多志同道合朋友们的多年努力下,教育部在1920年和以后几年,把小学至初中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小学教学取消了读经,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为了回击当时“国粹派”所说的“你们有新文学而无新文法”的谬论,为了巩固和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必须进行文字改革运动,因而必须找出写白话文的规律来。1920年,他开始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国文系教授,专门讲授以白话文的语言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国语文法”课。同时,他还兼任全国小学、中学白话文语法讲习所讲师及天津、保定、武昌、安庆、济南各讲习会语法讲师,为推广白话文奔走呼号。1921年,《黎锦熙的国语论坛》出版。1922年,他兼任天津、济南、上海、长沙暑期国语讲习所讲师。1923年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国文系教授,讲授国语文法、修辞学等课。

这一时期,先生还和钱玄同等人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笔画的方案,组成“汉字省体委员会”,任委员。1923年,国语会组成“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由先生、钱玄同、赵元任、黎锦晖(先生胞弟)等任委员。这一年,《国语月刊》的特刊号《汉字改革号》上,发表了《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强调词儿连写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也在这一年,他还首创并领导了国语会下的“国语辞典编纂处”,任总主任。

从先生在这一时期的实际表现看,应该说,他不愧是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冲锋陷阵的闯将,是推行国语的急先锋。

勇探文法

斗争的需要使先生潜心于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因为他知道:

一方面，既要广大学生学白话文，写白话文，就必须把白话文的规律教给学生；另一方面，既要推进文字改革，也必须搞清白话文组词造句的规律。当时，一般知识分子只知道文言文有文法，不知道白话文也有文法。如果告诉他白话文也有文法，他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当时的文法书，例如马建中的《马氏文通》、来裕恂的《汉文典》、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刘金弟的《文法会通》、吴明浩的《中学文法要略》、俞明谦的《国文典讲义》等，讲的都是文言文的语法，没有一本讲白话文语法。有的国粹派人物甚至公开叫阵：“你们有新文学而无新文法。”撰写一部介绍白话文语法的专著，已是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先生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

然而，这部白话文语法专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他认为研究本国语法有三条路线：一是以语法来促进现代汉语的规范化，这就要以语法为语文教学服务，以语法来指导学生的写作和说话；二是只搞古汉语语法，以语法为读古文服务；三是从普通语言学出发比较各种语言的语法，为语法而语法。他觉得第一条路线最切合现实的需要，第二、三条路线只能用教学的观点搞，即从教学的需要出发，用研究的成果为教学服务。后来在谈到语法研究的这一路线时，他曾明确地说：“国语文法，应该把一个活社会中语言的律令，用归纳的方法整理出来，确当、详备，可以用来作考证错误的尺度。没有这个，就是根本上还没有公认的语法。要想调查本地方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以便规定各学年国语上应注重练习的诸要点，可说是茫无根据。所以，这是国语科一切教材和教法上应先解决的根本问题。”

用这样的思想去构思新的语法理论时，先生毅然决然地摒弃了当时流行的“词本位”体系。因为这类只讲词类的语法书，经过多年的教学实验，大家认为对写作起不了作用。这时，西洋文法研究的一股“新潮”波及我国。先生受到这股新潮的启发，确定了“句本位”的体系。他在《新著国语文法·引论》开头就兴奋地写道：“诸君知道近来研究文法的新潮吗？简单说，就可叫‘句本位’的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文法。”“在西洋底文法课本，……近来大家也就主张一步一步地踏着‘句子’的自然的发展，用作修习文法底程途……”

他借鉴 J. C. 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把自己多年教学中积累的知识和已发表的论文整理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汉语语法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写成了《新著国语文法》和《新著国语教学法》两部专著，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关于词类，他分为：①实体词（名词、代名词），②述说词（动词），③区别词（形容词、副词），④关系词（介词、连词），⑤情态词（助词、叹词）。各类词又分几小类，有的小类还要再分类。关于句子成分，他分为：①主要成分（主语、述语），②连带成分（宾语、补足语），③附加成分（形容性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在这部书里，他针对汉语用词组句偏重结构、略于形态的特点，抛弃了词的性、数、格、体的概念，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体词七位”的理论，七位是主位、宾位、副位、补位、领位、同位、呼位。关于句式，介绍了单句的正式和变式、单句成分的省略、单句的复杂化。关于复句，他介绍了包孕复句、等立复句和主从复句。最后，还介绍了篇章结构和标点符号。很显然，这部专著规模宏大，体系完整，为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先生关于篇章结构的研究，比现在中外兴起的句群与段落的研究早了几十年。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不仅是我国全面、系统的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专著，而且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民族特点的语法专著。

《新著国语文法》刚一问世，立刻成为当时有影响的白话文语法的代表作，行销全国，被各级学校所采用。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约编《国语文法纲要六讲》，被译为日文，更名为“中国语法纲要六讲”。后来，日本又把全书更名为“黎氏支那语文法”出版。到1959年，《新著国语文法》总共出了24版，其在台湾印行的尚未包括在内。另外，它还被许多国家的图书馆收藏。如果说《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奠基作，对全国现代汉

语教学与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恐怕不是溢美之词吧。

深入比较

然而，先生并未就此止步。经过大约 10 年的努力，1933 年，《比较文法》由北平著作书店出版了。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比较文法》呢？先生在该书的“原序”中说：“1924 年《新著国语文法》出版之后，就着手续编一部《文法会通》。会通者，会古今之要，通中外之邮。旨趣和这部书一样。”本计划写三编，第一编是“词位与句式”，第二编是“词类”，第三编是“复式句与篇章”。可见先生原是要在《新著国语文法》的基础上，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发展，写一部可贯通古今、比较中外的语法巨著。但由于时局的发展，许多事进展不利，他只好根据当时教学的需要，把其中的第一编单独出版，故书的副标题是“词位与句式”。

怎么比较呢？先生在“原序”中说：“所谓比较，中外文法的比较是一义，古今文法的比较又是一义，后义比前义更重要。”“所谓比较，重在异而不在同：同则因袭之，用不着——比较；惟其异，才用得着比较，或大同而小异，或小同而大异，或同中有异，或异中有同。”

在《比较文法》中，中外文的比较主要是汉语和英语比较，不作重点，一般都放在每一节的参考里或问题（即思考题）里；而把重点放在古今汉语的比较上，一般都把它放在正文里详加论证。对古今汉语一致的地方，往往是现代汉语的例句少，而古代汉语的例句多；对古今汉语不同的地方，则一一明确指出。为了让读者的视野更开阔些，先生在每一章节里都列有“参考”“问题”两栏，告诉读者应参考什么书的哪一章节，应思考哪些问题。读者如果真的照此去做，一定会理解得更深入。

《比较文法》只讲词位与句式，篇幅却比《新著国语文法》第四章“实体词的七位”多了六七倍。只此一点，就可看出先生的研究是向更广更深的领域大大地发展了。

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

在《比较文法》里，先生从“词位与句式”的角度观察古汉语语法，顺利突破了古代汉语语法的八个重点和之、其、所、者等四个虚词的难点：① 疑否倒装——疑问句、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② “副位”免介——名词作状语或补语带不带介词均可，即普通名词可直接用为状语；③ “足位”免谓——判断句常不用“同动词”；④ “宾足”意使——宾语后的“足位”常跳上来作谓语动词，即“意动式”或“使动式”；⑤ 形附标“所”——“所”是“形附（定语）性语句”的标志，其为代词不变；⑥ 主领标“之”——“之”是“主语性领位”的标志。⑦ 联代用“者”——“者”必联形附（定语）充当之代词；⑧ 转化用“其”——“其”能代主语（主题）转入其他成分。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不同的地方虽然不只这些，但这些无疑是主要之点，人们掌握这些基本规律对学习古代汉语肯定会有很大帮助。

世界上许多语言有“格”，而汉语却没有；在有“格”的语言中，“格”的多少也不同。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先生在《比较文法》中告诉我们，汉语实体词的“位”与外语的“格”实际上是一回事，“位”在形态上表现出来就是“格”，“格”的根基是“位”。这对我们认识中外语言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对改进对外汉语教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1986年夏天，日中教育恳谈会副会长伊地智善先生来京参加“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时，曾满怀深情地对泽渝说，与会者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吃过黎先生“奶”的，并把特意带来的1943年日译《黎氏支那语语法》相赠。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的佳话，说明了先生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国际影响。

坚 持 奋 斗

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爆发抗日战争。北京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迁校于西安，合为西安临时大学。先生任国文系教授、主任。次年，西安临大迁至汉中城固，改

称西北联合大学，他继任国文系教授、主任。1939年，西安临大改为西北师院，后陆续迁往兰州。他兼任教务主任，一度奔波于城固、兰州两地授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被任命为西北师范学院院长。1946年，在兰州参加西北师院师生的复大运动（即恢复更名为北平师范大学）。是年冬，回北平任国文系主任、教务主任。1947年，任北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又借聘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同年兼湖南省文献委员会委员。不久，被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第一任委员。1948年，北平师范大学恢复校称，继任国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直到北平解放。

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我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科学和教育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艰苦的条件，动荡的生活，给先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然而，即使在这样十分不利的条件下，他仍然做出了令人赞叹的成绩。

在教学上，他除了开设原有的课程外，还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开设了音韵学、语言学概要等课，被称为当时西北研究音韵的领头人。他与卢前、魏建功合写的《中华新韵》，是当时“审音正韵”的一部官书。他主持了编修县志的工作，几年内出版了《黄陵县志》《同官县志》《洛川县志》《宜川县志》（后三种是与人合写的）等。他写的《方志今议》一书，1941年出版，1978年台湾曾再版，80—90年代大陆曾再版两次，可见它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利用编修县志的机会，先生还进行了当地方言调查，先后出版了《洛川方言谣谚志》《同官方言谣谚志》（与人合作）等。他一直坚持编辑出版《国语周刊》，继续推广国语运动。在他的倡导下，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白沙）、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1944年创办了国语专修科。这个科的毕业生有100多人在台湾光复后奔赴台湾，为宝岛推行国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他还写了《卢戇章传略》《钱玄同传》等重要著作。

再度辉煌

1949年北平解放（同年10月1日北平改称“北京”），神州大地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先生虽然开始步入老年，却像焕发了青春，踌躇满志地开创着未来。

这一年，他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各界代表大会代表，被指派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委会主席（相当于校长）。5月，“文字改革研究会”在先生等人倡议下成立。9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今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前身）成立，先生被任命为常务理事会副主席、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也在这一年，他出版了《国语新文字论》，为50年来文字改革运动作了总结，并提出了改进工作的意见。《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与白涤洲、肖永霖合编）先后出版。1950年，继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中国语法与词类》《新国文教学法》出版。1951年，《中国文字与语言》出版。1952年，《中国语法教程》出版。1953年，《怎样教学中国语法》（与刘世儒合著）、《字母与注音论丛》出版，由他负责、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同音字典》出版，《速成识字简明字汇》再版。

正当他乘风破浪顺利进展之时，心脏病突然袭击了他，他不得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不能到学校上课了，他就在家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进行指导。病情有所好转，他就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社活动。

1954年，他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届学部委员，兼国务院科学计划委员会语言组委员，国务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6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聘为四个中央单位组织的辞典计划委员会委员。1958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